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 词典编纂的描写原则和历史原则

信息·语言·辞书编纂

双语词典的编写

■ 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编纂专辑

专科词典中的语文词目

虚词词性标注的统一性和释义方式

■ 计算机在语言分析和词典编纂中的作用

新学科学名解释

新词新义小集

辞书研究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总第三十期)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二八六号

定价五角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四五七号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辑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辞书研究(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三月

1	郭良夫	词典编纂的描写原则和历史原则
· 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编纂专辑 ·		
9	舒 池	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改革
17	徐庆凯	对词典编纂条例的再认识
23	景 宣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大辞典》的编纂
30	商晓燕	《法学词典》的增订工作
33	雍求星	《民族词典》的中国特色
38	黄建华	词典论(十四)
46	尚 丁	信息·语言·辞书编纂
54	冯 利	词的“名义”与大型语文词典编纂
63	钱永心	计算机在语言分析和词典编纂中的使用
69	宛志文	虚词词性标注的统一性和释义方式
75	陈汝法	义项的共性和个性
81	王知伊	专科词典中的语文词目
· 我和词典 ·		
88	孙 钊	辞书残忆
91	李 杨	我的导师——辞书
93	巢 峰	再续辞书记失
100	晓 光	《体育词典》的特色和不足
104	周锡山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评介
107	黄鸿森	《神话辞典》及其翻译
114	吴 莹	双语词典的编写
123	吴克礼	双语词典词目释文的使用价值
131	章 何	谈教学词典例句的数量

· 杂 谈 ·

- 138 晁继周 中学生词典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140 程养之 “起”是标准新字形
 141 叶运升等 也来谈谈“起”

· 人 物 志 ·

- 143 褚绍唐 记地名词典编纂家葛绥成

· 释义探讨 ·

- 147 杨志政 “考竟”和“结竟”
 150 董咸明 “神策军”释义三问

· 新词新义小集 ·

- 154 [助学][班组][知青]
 155 [彩电][借调][调资]

· 新学科学名解释 ·

- 156 青年学(李燕杰)
 157 城市经济学 人口经济学(思惠)

- 补白** “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成立(62)

辞书架

词典编纂的描写原则和历史原则

郭良夫

《现代汉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及其后来出版的补编可供借鉴和参考。

《现代汉语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但是“规范”跟“描写”也不是对立的。规范是从众多的语言材料中

词典编纂，如同语言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说有两种原则：共时的(synchronic)和历时的(diachroic)。这两种方法或原则是有区别的，但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有联系的。

记录一个时代的语言的词典，例如现代汉语的词典，是描写现代汉语词汇的。这就是说现代汉语的词典，是依据共时的原则编纂的；共时的原则也就是描写的 principle。描写现代汉语词汇，不能不进行历史的研究，所以编纂现代汉语的词典，既要依据共时的即描写的 principle，又要依据历时的原则。

记录历代词汇的词典，例如在编纂中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是依据历时的原则编纂的；历时的原则和历史的原则是同义语。历史的研究，也要从描写的观点来研究各个时期、阶段的语言，所以编纂历史性的汉语大词典，既要依据历时的即历史的原则，又要依据描写的 principle。这方面，英国于 1933 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及其后来出版的补编可供借鉴和参考。

选择出合乎要求的形式来，并根据语言规律加以规定。描写是把语言实际记录下来，不加是非的判断。不过二者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分别只在表达方式和着重点上。例如规范性的汉语词典不会收“盖帽儿”（出类拔萃，盖过其余），“震”（超过，好极了）这一类词语；描写性汉语词典可能收这一类词语，但同时就会指出这是北京青少年群中新近出现的口语词。

有些词，看起来仿佛很新，例如“裸体”。收录近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词典都收有这个条目。先看《现代汉语词典》：

裸体 光着身子。

再看 1937 年初版，1948 年再版的《国语辞典》，连着出了两条：

裸体 赤体。

裸体画 摹绘人赤体之形态以显示人身自然之美者，始于希腊之裸体像。

台湾 1981 年初版，1982 年再版的《重编国语辞典》也有这个条目，可是释义不大一样：

裸体 赤身露体；亦作裸形，裸身。

“裸形、裸身”，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找不到，在近代汉语的词汇中恐怕也不容易找到，可是它却透露出这些词语是由来已久的消息。原来“裸体”并不是什么新词，南朝宋刘义庆（403—444）撰《世说新语》的《德行》门中就有：

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诸人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这个词儿，在五世纪可以说是“新语”。这真是个生命力很强的词，一直到明代，在口语中仍是使用不衰。例如徐渭（1521—1593）《渔阳三弄》杂剧：

当时曹瞒召客，令祢生奏鼓为欢，却被他横睛裸体，掉板掀搥，翻古调作渔阳三弄。

〔祢脱旧衣裸体向曹立。〕

〔校喝云：“禽兽，丞相跟前，可是你裸体赤身的所在？”〕

“裸形、裸身”也见于《世说新语》，如《任诞》门：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言语》门“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下，梁刘孝标注(462—521)注引《文士传》：

衡便止。当武帝前，先脱裈，次脱余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单絅，后乃著裈。

此外，还有“裸袒”，如《世说新语》的《德行》门“王平子……诸人以任放为达”条下，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又如《任诞》门“刘伶恒纵酒放达”条下，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

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裈衣。诸君自不当入我裈中，又何恶乎？”其自任若是。

《晋书》也有类似的“裸裎”，例如《范宣传》：

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

“裸裎”连文又早见于《孟子·公孙丑》：

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上述简单的考察已足够证明，“裸体”这词语是由来已久的了。《辞源》是古汉语词典，《辞海》也偏重收录古代语词。可是新旧《辞源》、新旧《辞海》以及《辞海》(增补本)，一概没有收“裸体”这个条目。我们只在旧《辞源》中查到了一条“裸体画”：

裸体画 画裸出之体，摹写人之肌肉以显其意态者。西洋当希腊时，即已盛行。

后来出版的新《辞源》把这一条删去了，删去的原因，新《辞源》的《出版说明》有交代：

根据本书的性质、任务，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术语。

“裸体画”，从旧《辞源》所给的释义来看，说明它的确是个现代词语，换句话说，是个新词。新《辞源》根据自己专修古代词语的任务，当然要把它删去。

《国语辞典》是一部近现代汉语词典，收了现代才产生的“裸体画”，又收了中古已经产生的“裸体”；这是不加区别，把二者看成一样的新词。《现代汉语词典》当然更是把“裸体”看成一个现代产生的新词。在这里，《国语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所依据的都是描写的原则。与此相反，《重编国语辞典》又把“裸体”看成跟“裸形、裸身”一样的旧词语。这也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描写。

如果除了描写，又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上面叙述过的情形：原来“裸体”的同义形式，不仅有“裸形、裸身”，而且还有“裸袒、裸裎”等。通过竞争，“裸体”这个词取得了优胜，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上，而它的那些同义形式，早已经成了没有人再使用的旧词语。由此可知，语言中的词要经过不断的历史筛选，才能获得生命。这一类生命力很强的词语，在现代汉语的词典里和古代汉语的词典里都应当有它的地位；词典既要描写它，又要叙述它，换句话说就是既要依据描写的原则，又要依据历史的原则。

新版《辞海》在注重文言词语的同时，还注意到俗语或口语的词汇。例如虫部有“虫蚁”一条。现在把这个条目连同它的第二个义项抄录如下：

虫蚁 指鸟，宋代以来俗语。《西湖老人繁胜录》：“赛诸般花虫蚁：鹅黄百舌、白鶲子、白金翅。”也作“虫鬻”。《西游记》第三十二回：“这虫鬻不大不小的……红铜嘴，黑铁脚，刷刺的一翅飞下来。”按今北方尚称鸟为“虫蚁儿”。

“今北方尚称鸟为‘虫蚁儿’”，这话是不错的。但是缺乏例证和充分的描写。前代和今天相联系的语言实例是有的，例如明朱有燉



(1379—1439)《赵贞姬身后团圆梦》杂剧第二折：

媳妇，你听甚么虫蚁这般叫得凄楚？

《赵贞姬身后团圆梦》这个杂剧写的是发生在山东济宁的故事。直到今天，山东的济宁话、巨野话仍然管鸟叫“虫蚁”。

《国语辞典》及其简编《汉语词典》收有“土药”一条。

土药 旧称中国自种之鸦片，对洋药而言。

《重编国语辞典》也收了这一条，释义大同小异，不妨也抄录如下：

土药 称中国自种的鸦片，外国输入者称洋药。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土药”，也没有收“洋药”。可能认为这两个词是近代汉语，不是现代汉语，所以不收。也有《现代汉语词典》收了，而《国语辞典》没有收的，例如：

细布 一种平纹棉布，质地比市布还细密。

有的词，《国语辞典》收了，《现代汉语词典》也收了：

广货 谓广东出产之货物。（《国语辞典》）

广货 旧时称广东出产的百货。（《现汉》）

研究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需要历史的考察，也需要描写的记录。仲芳氏《庚子纪事》的《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纪略》有一页日记，对于近代汉语词汇的记录和描写，对于词典编纂，都是有用的语言材料。五月十九日这一天的日记抄录如下：

顺治门内天主堂昨日余火未熄，浓烟迷漫。有人乘间捡拾教堂中未烧器皿，被洋人突出击毙数名。团民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暴殄天物，实为可惜。

这虽然是一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应当有一本近代汉语词典或现代汉语词典记录下来。上面列举的词典，都没有这样的记录；这也许

不是它们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恐怕还得另编一部词典。

结果表明，这“洋”字并未因此改掉。只是到后来，有的词如“洋药”、“洋烟”等，才从现代汉语的词汇里自然消失了。不过有了这记录，却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一种消长的趋势。如下表：

消	洋灰	洋火	洋油	洋人
长	水泥	火柴	煤油	外国人

但是“洋”字不会消灭，还是用得着的，例如“洋为中用”、“土洋结合”等等。

如果我们的词典里有足够的记录，充分的描写，是可以反映出词汇的发展趋势的。

叁

词典收词，要看它有没有新意义；有，就值得收；没有，就不值得收。例如作家凤子在《话说什刹海》一文中用了个词儿叫“冰棍棒”，就只是冰棍的棒，没有什么新意义；收到词典里来干吗？剧作家曹禺在《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一文中有一段话说：

当时（按指本世纪初——笔者）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大家称这种戏为“新剧”，以区别于旧的戏曲。

“新剧”有新意义，指话剧，所以《国语辞典》收了。又如“新房”，有新意义，指新婚夫妇的卧室；尽管是旧房子，只要做了新婚夫妇的卧室，就叫做“新房”。当然，“新剧、新房”除了有新意义以外，也还有它原来的字面意义：新的戏剧；新的房子。近来，人们说的“新房”，有时候就是指新的房子。这样的字面意义可以不用写进词典里列为义项，但是也可以写进词典里列为义项，例如“半天”和“半夜”，《现代汉语词典》就各列了两个义项，一个是字面意义，一个是指新意义。略去例句，节录如下：

半天 ①白天的一半。②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半夜 ①一夜的一半。②夜里十二点钟前后，也泛指深夜。

“老好人”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带引号的好人。

老好人 〈口〉脾气随和，待人厚道，爱憎不鲜明，没有原则性的人。《现汉》

这是通常的共同了解，可是“老好人”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好人。例如老舍《茶馆》第一幕：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这“老好人”的意义，可以说是字面的；不过这种字面意义，跟“坏人”相对的“好人”，容易被人忽略，反倒透着些新鲜。依据描写原则编纂的词典，应当记录下来，列为义项。更加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服装”的一个意义。例如《人民日报》1984年10月6日第八版的一篇通讯，是报道美国戏剧节的，其中有一段话：

这台戏演出的时候不穿服装，顶多找些代用品，不化装，没有布景。“不穿服装”的“服装”，意义当然有些特殊，指戏装。说特殊，也不算怎么特殊，比如“化装、布景、灯光、道具”的“特殊”意义，在现代汉语的词典里都可以找到，而“服装”的“特殊”意义却找不到。

《现代汉语词典》有“红脸”一条，列了两个义项：

红脸 ①指害羞：这小姑娘见了生人就红脸。②指发怒：我们俩从来没有红过脸。

跟“红脸”的意义相当的古汉语是“朱颜”。先看新版《辞源》的解说：

朱颜 红润的面容。《楚辞·宋玉〈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略去一例）也泛指少时美好的面容。《花间集补·下》南唐李煜《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再看新版《辞海》的解说：

朱颜 ①指女子美好的容颜。《楚辞·大招》：“容则秀雅，稚朱颜只。”（略去一例）②指青春壮健的颜色。李端“勿以朱颜好，而忘白发侵。”（略去一例）

“美好的面容”、“美好的容颜”，跟“娇羞”的意思接近，古代有没有指发怒的意义？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梁代刘孝标注引《康别传》：

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王戎字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可见“指发怒”的意义，是由来已久的。

不往远里说，就说近几十年，词和词义的演变，就很值得过细地考察一番。例如我们的词典里有“节目”这个词目，却没有“小节目”的词目，而且给“节目”列出的义项，仅限于“文艺演出或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的项目”。如果“小节目”不另立目，“节目”的义项就还得增加。例如老舍《骆驼祥子》：

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

无论是充分地描写，还是全面的历史叙述，我们都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才可望词典编纂取得更好的成绩。

（上接第103页）

共同的根本点，即为了得分的目的把球攻向对方的球门，抓住了这一点就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如果分别介绍，便觉累赘。还有可能顾此失彼，比如《词典》中足球、手球、水球等有“射门”，曲棍球里就没有了。而在冰球里，则改为“射球”，恐怕也未必妥当。象“守门员”条，也有这种情况。这种分类方法，还不可避免地要遗漏一些本来不应漏掉的常用词。如“净胜球”，放在各单项里介绍无此必要，但又找不到它们的适当位置。

在《体育词典》的笔划索引中，如果一个词条分属于不同类别，都是在不同的页码前用括号注出那些不同的类别。如“拳”，用“马术”和“武术”标出；“特级大师”，用“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分别标出。这种做法，节约了读者的许多翻检之劳，是值得提倡的。

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编纂专辑

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改革

舒 池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我们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的编纂和研究工作怎样适应奔腾向前的改革形势，给予了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动。我想就加强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加强发展研究这三方面，来谈谈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的编纂和研究的改革问题。

一、加强理论研究

加强理论研究，早日建立专科词典编纂学，这是关键问题。专科词典的编纂和研究，根据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可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理论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有指导作用。没有理论研究，不把感性认识经过思考的作用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都会因为认识不够深刻、视野不够开阔而处于狭

隘、肤浅甚至深入不下去的境地。当然，理论研究也需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作为支撑，否则将因缺乏对象而陷于空洞。马克思主义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理论，是我们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指南。

专科词典理论研究的成果，集中表现为专科词典编纂学的建立。专科词典编纂学是辞书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单语专科词典和双(多)语专科词典（两者都包括社会科学专科词典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专科词典）为研究对象，以这些词典的编纂理论、编纂实践和编纂历史为研究范围。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也许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专科词典的分类和各种专科词典的性质、特点和功用。(2)各种专科词典的编撰原则和方法，主要可分为写法和编法两大部分，以便分别探讨撰稿以及审稿、汇编和加工整理两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中，有些是各种专科词典共有的共同性问题，有些是每种类型的专科词典所特有的特殊性问题。例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专科词典的编撰，就有不同于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的特点。由于单语社会科学专科词典所遇到的问题和疑难杂症多于其它类型的专科词典，笔者个人认为，专科词典编纂学的内容，不能不将重点放在单语社会科学专科词典上面。(3)中外专科词典的编纂历史。从《辞书研究》上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我国的辞书工作者已对专科词典的编纂经验着手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使专科词典编纂学的建立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不可否认，专科词典的理论研究迄今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必须大力改变专科词典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

二、加强应用研究

加强应用研究，使专科词典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专科词典编纂改革的主体。在专科

词典编纂和研究的三个基本环节中，应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它在当前所面临着的问题，是如何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笔者个人认为，似可着重进行求新、求精、求深三方面的探索。

先说求新。下列问题值得思考和探究：

1. 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在学习《决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决定》充满了一个“新”字，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新的政策。社会科学专科词典与《决定》关系密切，如果不把《决定》的精神贯彻到词典中去，显然不能保证词典的质量，甚至会犯政治性错误。因此，对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的撰稿者和编审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认认真真地钻研文件，深入领会文件中的每个新提法，并结合本学科的实际，举一反三地研究在传统的理论、观点和提法之中，哪些是过去正确，现在正确，今后也正确的；哪些是过去正确，现在却因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得不适用了；哪些是“左”的思想的产物，即使在过去也是不正确的。分清正确与否以后，就可决定哪些应保留，哪些应改变。《决定》的精神，并不仅仅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策性较强的学科和条目有关，而且同一切学科、一切条目（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的学科和条目）有关。例如，《决定》要求我们联系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消除“左”的思想影响，摆脱旧的传统观念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这对任何学科、任何条目都是适用的。各种专科词典的编纂，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深受“左”的思想和苏联辞书模式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已经破了不少，但是还须根据《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开展立新破旧的工作。

2. 如何考虑新的选题、新的品种。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制订出书远景规划的时候，曾提出大、中、小并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制定的该社八十年代选题计划，就社会科学专科词典而言，包括三个方面：（1）对一些基本学科和对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关系较大的

学科，即对文、史、哲、经、教（教育学）、法（法学）等大学科，出版大型专科词典；（2）尽快实现每一学科有一本实用的中型专科词典；（3）对普及性较强的学科，出版小型专科词典。这一指导方针和选题计划，具有基本建设的意义，在没有完成以前似宜保持不变。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根据新的情况和形势，再发掘和增加一些新的选题、新的品种。笔者个人认为，社会科学专科词典的品种，今后也许可从下列四方面考虑增加：

首先是适应科学文化大普及的需要，分别以大、中、小学生和自学的成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编纂出版青年文科词典、少年文科词典、儿童文科词典和成人文科词典。

其次是适应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编纂出版衣、食、住、行、用、乐等方面的专科词典，以便有助于建立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考虑专科词典品种的时候，视野要不再局限于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范围，而应把生活资料的其它两个方面——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也包括进去，从四个领域的有关学科和有关问题中开掘选题。

第三是适应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加强相互渗透的需要，编纂出版边缘学科词典。

最后是适应出好工具书、多出工具书、快出工具书的需要，编纂出版“工具书的工具书”，诸如中外地名大辞典、中外人名大辞典、中外职官辞典、中外历史年表、辞书学词典之类，使专科词典的编纂也能获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益处，从而有助于保证词典的质量，加快编纂的步伐。

次谈求精。随着人们求知欲望的日益增长，辞书（包括社会科学专科词典在内）更应力求增强科学性，向读者提供可信的内容、可靠的知识。特别是对一些常见常用的词语和著名人物的学历、经历，后出的辞书更应订正先出辞书中的“传统失误”。酌举两例供参

考和探讨：

例一，对授予莱布尼茨以法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在过去出版的辞书（包括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在内）和教科书中，往往写作莱比锡大学。查阅德文、英文资料以后，就可发现这一说法不够确切。实际情况是：莱布尼茨十五岁时（1661年）入莱比锡大学就读，1666年提出博士论文，该校却嫌他年轻，拒绝接受。他将论文寄往阿尔特多夫大学，立即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因此，对莱布尼茨的学历，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十五岁时入莱比锡大学就读，后一度转入耶拿大学，不久即回原校。1666年向莱比锡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该校嫌他年轻而拒绝接受。他将论文寄往阿尔特多夫（Altdorf，当时属纽伦堡自由市，今属瑞士）大学，立即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例二，对于克里姆林，在过去出版的辞书中，一般存在着下列不够精确之处：（1）将克里姆林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完全等同起来，没有注意到俄文 *кремль* 一词，首母有小写、大写之别。首母小时，指俄国大城市中的内城。首母大写时，才专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2）认为十月革命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立即成为苏联最高党政机关的所在地，没有注意到十月革命后至 1918 年 3 月 10 日止，首都仍是彼得格勒，而且在 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前，国名应作苏俄而不作苏联。

再谈求深。任何一部辞书的使命，都是向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提供他们希望在本辞书内获得的知识，社会科学专科词典也不例外。上海辞书学会理事俞克忠同志在一次辞书学讲座中说，辞书的读者对象可分为本行、内行、隔行和外行四档。专科词典的读者对象，显然以本行和内行为主，这是它同以隔行和外行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综合性辞典（如《辞海》）的最大区别。本行和内行的专业水平，虽然有高、中、初等之分，但是同隔行和外行相比，终究起点要高。他们对专科词典的要求，必然是希望在词典规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专业知识。因此，专科词典的性质决定